

宋辽金时期的马球运动

□ 张长海

马球,古称出鞠、打球或击球,是骑在马上以球杖击球入门的一种运动。关于马球的起源众说纷纭,有“波斯说”、“吐蕃说”和“中原说”,至今尚未统一认识。马球在我国汉代就有记载,盛行于唐、宋、辽、金,至清代开始淹没。现代马球运动是在19世纪50年代由英国人从印度带到欧洲并传播至全世界。下面就从宋辽金时期出土有关打马球的文物并结合文献的记载,对当时马球运动的场地、器械、服装、规则等方面作一粗浅的探究。

一、马球场地

球场是举行马球运动的场所。

1. 面积

目前还没有发现当时球场的遗迹,球场的面积也就无据可查,只能在零散的诗词中找到一些痕迹,如“球场千步平如削”(韩愈《汴泗交流赠张仆射》)、“打球筑场一千步”(陆游《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筑场千步柳营东”(陈元晋《打球口号戏陈统制》)。说明从唐至宋、明球场的周长为1000步,这与近代英国和欧美球场定为1000码和我国现代马球周长1000米基本相符^[1]。

2. 边界

即马球场最外的界限。从韩愈“短垣三面缭逶迤”的诗句中可看到当时马球场地三面是矮墙,剩余一面为观众台,“短垣”即边界,有土垒、石砌的,还有以锦锻做的障,如“龙德元年,蜀主(王衍)常到锦步障,击球其中。”^[2]现代马球运动的短垣为木版。

3. 球场

泥地球场:采用经细筛的泥土,反复夯打,滚压而成。其中讲究的是“洒油以筑球场”,其效果是“平望若砥,下看犹镜,微露滴而必闻,纤飞而不映”^[3]。

草地球场:“球场新开向东苑,一望晴烟绿莎

软。”^[4]就是当时诗人对草地球场的真实描绘。还有一种泥土场地久而不用,其上生杂草而形成。唐代李肇《国史补》卷中所记“球场草生,何也”对曰:“虽然草生,不妨球子往来。”说明草地球场是一种天然的。

沙地球场:泥地球场地的一种。因下雨,以细沙垫地的一种泥地球场。“时召诸将击鞠殿中,虽风雨亦张油帘,布沙除地”(《程史》卷2)说的就是用油布遮雨,以细沙垫地的沙地球场。

二、球门

球门分单球门和双球门。

单球门在出土文物中目前还没有发现。在《金史·礼志》中记载:“先于球场南立双桓,置板,下开一孔为门,而加网为囊,……。”这是对当时单球门的记载。

双球门:1990年秋季和1995年夏初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发现了二座绘有打马球的辽代壁画墓葬,对马球球门进行了详尽的描绘。皮匠沟辽墓是这样描述的:“在第5人的右上、第4人的身后为一红色窟窿形球门,外侧下方有一方形口。在第1人的马后,还绘有一物,但因剥落严重,已无法辨认。”^[5]壁画中无法辨认的地方,根据方位和痕迹也是球门,这是一幅双球门的壁画。七家辽墓是这样描述的:“左右两侧各画一球门,球门为两个红色柱,柱上端出尖桃形。”^[6]《宋史·礼志》卷一百二十一记载:“……竖木东西为球门,高丈余,首刻金龙,下施莲花座,加以彩绩。”《金史·礼志》记载:“……或曰两端对立二门,……”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基本一致。另外,宋人《明皇击球图》^[7]中描绘的球门与《金史·礼志》中所描绘球门的形象基本一致。说明宋代人描述唐朝的球门是按照宋代的式样来绘制的。“球如星,杖如月,骤

步随风直冲穴”描写的“穴”就是球门。当时球门的高度：“球门，高丈余……”（《金史·礼志》卷12），这里的“丈余”约合现代的3米多，可见与现代马球门的高度基本相似。朝鲜《大典会通·兵典》卷4中也记载了球门宽为5步。上述的高度和宽度是指两柱的高度和宽度。明代王绂《端午观骑射击球待宴》诗中有“彩色球门不盈尺”之句，可见“孔”或“穴”的直径不超过一尺。这是指“孔”的宽度。现代马球门只是把古代马球门的“孔”去掉之后的现代形式。

此外，球门还有有无守门员之分。内蒙古敖汉旗发现的二座辽代打马球壁画墓中就无守门员，宋《明皇击球图》则描绘了有守门员的形象。《金史·礼志》中也对守门员也有记载：“左右分朋主之，以二人守门，……。”

三、球杆（杖）

文献中称“球杆、鞠杆、球杖、球拐、画杖”。从内蒙古皮匠沟辽墓^[8]、七家辽墓的壁画^[9]、山西侯马^[10]和襄汾打马球砖雕金墓^[11]、河南洛阳出土的打马球宋代砖雕^[12]、宋人《明皇击球图》^[13]、宋代《击球图绢画》^[14]、辽陈及之《便桥会盟图》^[15]可看出宋辽金时期的球杆是一种杆端弯弧较大、其夹角为钝角的球杆，与《金史·礼志》中的记载：“……持鞠杖，杖长数尺，其端如月”基本一致。球杖的材料，据《续文献通考·乐考》：“金贞祐三年七月，工部下开封市白牯取皮，备御用取鞠杖。”既言买白公牛皮制球杖，可能是在木质球杖外层（或手握处）镶以白色牛皮。推想当时已有专制球杖的工匠了。

四、马球

马球分皮质和木质两种。《金史·礼志》载：“球状小如拳，以轻韧木枵其中而朱之。”说明当时马球的球大小如拳，圆形，木制并涂有颜色（红）。内蒙古敖汉旗皮匠沟辽墓打马球壁画中描绘的就是一只“大小如拳”的红色球。从“鞠”字理解，“以韦为之实以柔物”，就是在皮质球壳中塞以毛发。元末熊梦祥《析津志辑佚》载：“一马前驰，掷大皮缝软球于地。”这就是皮质的球。此外球上还有图纹的球，如沈约《幸梨园亭观打球应制》载：“飘摇拂画球。”

五、球服

从出土文物来看，内蒙古敖汉旗七家辽墓和皮

匠沟辽墓壁画中是这样描绘打马球球服的：“头戴圆顶帽和平顶帽，圆领，紧袖长袍，腰间系带，足登靴”、“头戴斗笠式毡帽，身穿窄袖红袍，腰系白带，足蹬黑靴。”山西襄汾曲里村和侯马金墓报告中对打马球球服的叙述：“头扎软巾，身着长袍，足登马靴。”说明当时打马球还是有规定的服装。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对打马球的球服是这样描述的：“先设彩结小球门于殿前，……花幞头，半着红，半着青锦袄子，义襴束带，丝鞋……。”其中所叙述的“锦袄子”、“花幞头”、“丝鞋”就是当时的马球服，与上述出土文物基本一致。敦煌遗书 S2049、D2544《杖前飞·马球》之：“脱绯紫，着锦衣……。”其中“锦衣”就是唐代的马球服。明代诗人王绂在《端午观骑射击球待宴》中描写马球服“锦袍窄袖”。上述的“锦衣”、“锦袄子”、“锦袍”就是当时的马球服。唐代时成都官员用蜀锦工匠缝制的打球衣作为贡品向朝廷进礼。《唐书·敬宗本纪》载：“长庆四年四月，西川节度使杜员颖进球衣伍百。”说明从唐朝至宋，一直至明朝，人们就用“锦衣”来作球服。当时的球衣非常讲究，一般都用绣有团花的锦缎制作，并配有镶珠嵌玉的腰带（见宋徽宗《宫词》）。马球服还包括帽子和靴。打马球时头戴“垂脚幞头”、“软巾”和斗笠式毡帽显得矫健敏捷，其中斗笠式毡帽可能还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这与现代马球运动中的软木质帽子近似。靴是北方牧民的着鞋，多以牛皮缝制，利于乘骑，称长靴或乌靴。内蒙古敖汉旗两座辽墓和山西侯马、襄汾金墓出土打马球人的着鞋可能就是这种鞋。着这种靴打球一则可以保护打球者的腿部避免受伤，另则也是骑马必须。

六、比赛规则

宋太宗赵灵于太平兴国年间（926—984年）曾令主管机构制订击球仪式。从《宋史·礼志》记载和出土文物可见当时打马球的规则如下：

- 1.打球分两队竞赛，以“承旨”守门。内蒙古皮匠沟辽代打马球壁画墓中还有裁判。
- 2.每队人数无定额。少则二人，多则百人。
- 3.两队所着服装各异，以便识别。
- 4.两队待球掷至球场中央即开始比赛。单球门赛以球打入球网为胜，双球门赛将球打入对方球门为胜。

总之，宋辽金时期，由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

分尖锐,各国从军事战略考虑,为提高自己的骑兵队伍,所以把打马球作为锻炼骑兵砍杀的一种手段,因此马球运动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这与《宋史·礼志》中记载“打球本军中戏”的情形是一致的。通过马球运动的普及和重视,在这一历史阶段马球场地、器械、服装、规则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发展,这在出土文物和《宋史·礼志》、《金史·礼志》等其他文献的记载中得到了证实。此外,打马球运动还从部队和达官贵人的范围普及到民间,山西侯马、襄汾一带金代砖雕墓中出现的打马球砖雕,说明民间打马球运动的蓬勃兴起,这与当时把击鞠作为选拔人才的考试项目有关,也与当地的经济水平有很大的关系。宋辽金时期的马球运动主要是为了适应军事的需要,且北方省份有广泛的平原,适应骑兵部队,因此,在北方建立的宋、辽、金政权,都非常重视骑兵部队的建设,同时也就重视马球运动的开展,这样打马球运动也就蓬勃开展起来。

[1]庞复延 1957 年制定中国马球规则时以美国马球

总会编写马球规则为蓝本,将欧美流行的球场周长 1000 码定为 1000 米。

[2]《资治通鉴·后梁记》。

[3]《资治通鉴》卷 209,刘谏《隋唐嘉话》。

[4]明《端午观骑射击球待宴》。

[5][8]内蒙古市敖汉旗博物馆《内蒙古敖汉旗皮匠沟 1、2 号辽墓》,《文物》1998 年第 9 期。

[6][9]《敖汉旗七家辽墓》,《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 年第 1 期。

[7][13]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藏画集续集》上册,文物出版社 1980 年。

[10]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山西侯马 102 号金墓》,《文物季刊》1997 年第 4 期。

[11]解希恭《山西襄汾县曲里村金元墓》,《文物》1986 年第 12 期。

[12]中国体育博物馆收藏。

[14]刘宝慈《观天津博物院历史部收藏钜鹿发掘宋大观复残画答客门》,《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第 5 期。

[15]徐琴久《谈陈及之的便桥会盟图卷》,《美术》1955 年第 12 期。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上接 35 页)

凉,普通平民百姓自摇其扇自得其乐,贵族士大夫也手持小扇怡然自得。唐末画家孙位《高逸图》中绘有一高士手持小扇安坐笑谈;南唐画家顾闳中名作《韩熙载夜宴图》也有主人翁袒胸露腹、挥扇听乐的场景。另一方面短柄扇也用来障尘蔽日。《世说新语》中有“大风扬尘,丑导以扇拂尘”。宋代宰相司马光“乘马或不张盖,身持扇障日”。无论“障尘”还是“蔽日”,都是扇子的阻隔作用。古人还常用扇子遮挡脸面以免被人看清,其作用类似于帘子、纱巾或今天使用的墨镜。宋代程大昌《演繁露》称:“凡扇言障,取遮蔽为义。以扇自障,通上下无害。”因为扇子遮面的作用,古代直接称之为“屏面”、“便面”。《汉书》卷七十六《张敞传》中有唐代颜师古作注:“便面,所以障面,盖(车) [扇]之类也。不欲见人,自以障面则得其便,故曰便面,亦曰屏面。”^[2]初期以扇障面都是出于现实的需要。《世说新语》中言晋武帝之婿、驸马都尉王敦一见到周就面红身热,虽挥扇难止,后来他每瞧见周都以扇遮面。《晋书》记:“武帝太始中,曾博选良家女以充后宫……时卞藩女有美色,帝掩扇谓后曰:‘卞氏女佳’。”这是男性掩扇例子,

女性更常用扇子掩饰。晋代女诗人桃叶《团扇歌》之三云:“团扇复团扇,持许自障面。憔悴无复理,羞于郎相见。”唐代王建《调笑令·宫中调笑》亦云:“团扇,团扇,美人病来遮面。”后来短柄小扇子的制作愈加精致细巧,它不同于长柄大扇理性的威严、工整,而是流露出感性的亲切、潇洒,小扇的这种遮饰作用渐渐具有了个人装点修饰的意味,演变成一种以礼仪美饰为主体价值的名流雅器。

赵翼《二十二史记》云:“六朝人清谈必用麈尾……盖初以谈玄用之,相习成俗,遂为名流雅器,虽不谈,亦常执耳。”古代还有“武不离剑,文不离扇”之说,“羽扇纶巾”成为儒将风范的代名词。文人士大夫持扇指点江山,谈古论今,更添几分雅风文气;至于后来携带更加方便的折扇兴起,众多的才子佳人更是扇不离手,成为潇洒倜傥、典雅高贵的最佳设计。

[1]《清异录》。

[2]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 1962 年 6 月,3223 页。

(作者工作单位: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